

熊伯龙的无神论思想

张璠 黎德扬 黄劭邦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熊伯龙的无神论思想



张璠 黎德扬 黄劭邦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重 版 说 明

本书是1983年出版的。为了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,尊重科学,宣传无神论,现重版。这次重版时,编辑将原书名《熊伯龙与〈无何集〉》作了更改,并对个别处作了更正。

熊伯龙的无神论思想

张 瑗 黎德扬 黄劭邦

出版: 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:

地址: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
邮编:430022

印刷:湖北中光实业公司印刷厂 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4.25

字数:77千字 插页:1

版次:1999年9月第2版 印次:1999年9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3 601—5 600 定价:6.40元

书号:ISBN 7-216-02654-3/B·139

鄂新登字 01 号

前 言

熊伯龙(公元一六一六——一六六九年)字次侯,号塞斋,晚年别号钟陵。湖北汉阳县人。自幼读书刻苦,及长,擢进士第,授国史院编修、内翰林秘书院侍读、祭酒,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他是我国清初杰出无神论思想家。

熊伯龙擅长时文,与刘子壮齐名,世称熊刘。他著有《谷谿堂全集》(或称《熊学士诗文集》)。该书是研究政治思想、文学理论的重要材料。其诗文,在中国文学史上未曾提到。而《无何集》一书则是他阐明无神论思想,批判宗教神学的著名专著。

熊伯龙自幼不信祸福机祥,中年,著论批判鬼神迷信,晚年,犹孜孜不辍从事无神论研究,一直到一六六〇年前后,《无何集》一书才脱稿。熊伯龙编著《无何集》的宗旨欲以“醒世人”。他生当满清最高统治者倡导天命论神学迷信、推行蒙昧主义的时候,而他竟敢蔑视神学权威,触犯神学禁区,真不愧为战斗的无神论者。《无何集》一直被视为禁书,他死后一百二十五年(乾隆五十九年)才刊行问世。一九二五年湖北沔阳卢弼借北京大学藏本影印,

第二次出版。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校点整理，第三次出版。熊伯龙无神论思想长期被埋没，近几年来，才为较多的人重视和研究。

《无何集》编成，广泛搜集了自春秋战国以来，尤其是对王充以后一千五百年来，无神论和有神论斗争的资料，对以往宗教神学都加以重新审查，内容是非常丰富的；《无何集》中批判的锋芒，涉及到神学广泛的领域，其着重点放在我国传统的天命观神学目的论。这在我国无神论史上是罕见的。

《无何集》全书探讨了天的性质问题、天人关系问题、无鬼论、道虚论、非佛论、非命论等无神论重大问题的理论和观点，就其批判的深度或广度言，较之前人有所充实，有所发展。同时又解剖了广泛流行的禁锢人心的形形色色的世俗迷信，继承和发扬了王充的战斗风格。书中还运用巧妙手法，揭示神学内在矛盾，暴露其虚伪本质，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总之，熊伯龙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，取得了重大成就，《无何集》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无神论珍贵文献。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，熊伯龙对神学的解剖不免带有朴素直观的性质，还夹杂着一些正宗儒学腐迂见解，因此，有些观点显得粗糙、肤浅、陈旧。

我国有丰富的无神论文化遗产，《无何集》就是这份遗产中珍品之一。研究中国无神论史，总结无神论和有神论斗争的经验和教训，有利于我们与封建迷信作斗争，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，有利于社会主

义精神文明建设,这就是我们研究熊伯龙《无何集》的目的所在。

由于认识水平和专业知识有限,这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错误,殷切期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教。

作 者

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五日

目 录

前 言	1
一 熊伯龙的身世	1
二 《无何集》成书经过	3
三 熊伯龙生活的时代	10
四 关于天的性质问题	18
五 关于天人关系问题	25
六 无鬼论	39
七 道虚论	53
八 非佛论	64
九 非命论	76
十 析忌讳	88
十一 理论与方法	103
十二 结束语	114
附 录:	
熊伯龙传(之一)	123

熊伯龙传(之二)	123
熊伯龙史迹访问记	125

一 熊伯龙的身世

熊伯龙字次侯，号塞斋，为不忘祖籍，晚年别号钟陵，今湖北汉阳县人。据康熙岁次庚戌年弟王清撰《谷谄堂全集》序，他卒于己酉即康熙八年（公元一六六九年），终年五十三岁，推其生年应为明万历四十四年（公元一六一六年）。

熊伯龙出身于仕宦之家。曾祖父熊珙曾任明朝楚府典宝，祖父熊士章随从熊珙至汉阳侍侯。珙死后，留居汉阳，入胶庠，成为有声望家族。父鸣盛，明天启元年（公元一六二一年）举人。进京后，与朝政不合，遂不复上公车。鸣盛生子女五人，“忆昔吾父丧，男女五童痴”。长子伯龙，次子仲龙，三子叔龙。顺治年间，仲龙、叔龙同选拔贡。仲龙官至汝宁知府，叔龙官至华阳训导。子正策，正笏，正笏为荫生，举康熙十七年乡试。孙祖旆、祖旋、祖旗，祖旋康熙二十年举人，官乌义知县。熊伯龙幼聪敏，能诗文，下笔风韵，就学于汉阳嵩阳寺，攻读刻苦，日以继夜。有人劝慰说“熊伯龙，熊伯龙，富贵不可强求，其奈命何！”他回答道：“命奈我何！”九岁时，六经子史，诸家诗文，均能强记背诵，补博士弟子员。十一岁时，老师以“天下归仁”命题

为文，废寝忘食，几易其稿，达旦始罢。后随名师宿儒学，谦虚求教，旋组织“寻社”，结集江汉地区能文者二十二人，经常研讨诗文，该社曾一时声噪东南间。

顺治五年（公元一六四八年），熊伯龙由拔贡举顺天乡试，名列第一。顺治六年（公元一六四九年），以《廷试策》一文，中顺治己丑一甲二名，廷对第二名，进士榜眼，授国史院编修。十一年充任浙江乡试正考官，门下多知名之士。十六年奉命提督顺天学政，精于制义，疏通朝政，累见勋劳，晋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。任京官二十年，殁于任所。初葬汉阳县龙窝掌，后迁葬于新收堡（今汉阳县蓼山）。墓石碑文已泯灭，姓名科第名次遗痕，尚清晰可见。

熊伯龙擅长时文，工八股。“精字母反切之学，知西洋天文、算法，又通佛学，解翻译，其杂著似唐荆川，律诗类中州集。……”（第484页，本书引用熊伯龙的材料，均见《无何集》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，下边引文，只注页码）熊伯龙死后次年，其次子汇编其遗文为《谷谿堂全集》或称《熊伯龙诗文集》，有诗二百九十一首，杂文七十八篇。其诗文，中国文学史上未曾提到，价值似乎不大，该书是研究熊伯龙政治思想、文学理论的重要资料，而《无何集》则是熊伯龙阐述无神论思想，批判宗教神学的著名专著。

二 《无何集》成书经过

《无何集》书名由来，导源于荀子《天论》。在自述中，熊伯龙写到：“庚子初夏，灯窗读《荀子》，有曰：‘雩而雨，何也？曰：无何也，犹不雩而雨也。’世人不解斯言，遂疑天地如何护佑，善恶如何吉凶，神鬼如何灵，祈禳如何验。精如仙佛、粗若果报诸般，以及山川草木之神，飞走昆虫之怪，历历可指。……士大夫沿习成风，牢不可破，正坐不知‘无何’二字耳。余博览古书，取释疑解惑之说，以《论衡》为最。特摘其尤者，参以他论，附以管见，名曰《无何集》。”（第6页）综观全文，可见“无何”二字，饱含着反对神学的意思，所以说，《无何集》本质上就是无神论集。

《无何集》是在熊伯龙编著本的基础上，由他的几代子孙略加增订而成。据《无何集纪后》载：“是书先太高祖学士所编，叔高祖元献公增校，凡三易稿而后成。初藏伯曾祖可亭公家，康熙甲戌遭回禄，藏书悉焚，兹编幸未被灾。先祖因更校亥亥，钞录数部，藏于匣中。培仁又逐篇增补数条。衡衡子见而叹曰：‘真千古异书也！急为开雕。’培仁不忘刻者之功故详其始末云。”（第483页）结合“庚子夏初，灯窗读《荀子》”考察，熊伯龙编辑修订《无何集》

的工作，已于一六六〇年大体完成；“叔高祖元献公增校，凡三易稿而后成。”熊正笏、熊正策兄弟对《无何集》增校，花了气力，作出贡献。随后其六世孙熊培仁又整理修订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《无何集》是熊氏一门编纂的一部类书。

这部书，熊伯龙广泛地搜集自春秋战国迄至明清之际，我国无神论论述，以《论衡》为主，编为天地类、古今类、鬼神类、祸福类、灾祥类、感格类、宜忌类、人事类、儒术类、道教类、杂家类、百物类十二卷。《论衡》说未畅者，引他说以申之，说未及者，取他说以补之，末附《委婉续貂》一卷，全书共十三卷。在编目中，凡标“篇”字，是辑他人之说，称“段”者多系自撰，在辑录之后，加“总评”“附说”，阐述自己的观点。就编排形式说，上述分类方法的优点是，标题是十分明显的，条理也是比较清晰的。但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。比如：有的类与类之间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，有时又把不同的问题拼凑一起，或者把某些同类性质的问题割裂开来。如杂家类、百物类，可不必单独列出，有关内容并入其它类，而每类中子目又分得过细，不免有点重复零乱。因此，有的类中心思想不够突出。

在清代文化专制主义高压下，这部书，熊伯龙编著后，生前未刊行。他不胜感慨地说：“余以白屋寒俊，妄欲修汉儒之书，补前贤之缺，不胜为笑耳。然而藏诸名山，传之百世，后之君子，其必有以处之矣。”（第8页）流露出惟恐被指责离经叛道，诋毁先圣的戒心。所以，力辨王充宗孔，而他宗王充。但他敢于冲决“畏天命”的罗网，触犯神

学禁区，蔑视神权权威，著书立说，不愧为杰出的无神论者。就《无何集》中保存读者评语看，已有人阅读过《无何集》抄本。例如：黄敬渝说：“及见先生抄本，精萃简要，分选编类，增广美备，喜出望外，因口沫手胝昼夜不倦。……”（第7页）。宋荔裳说：“中令尊信孔子，以半部《论语》治世，为太平宰相；次侯删仲任之书，以半部《论衡》醒世，为一代伟人。”（同上）何省斋说：“读此数篇，则《无何集》一书，无怪乎当今之世无有称之者。虽曰挾《论衡》之精华，又采辑群书以补仲任之不足，可谓千载之异书，书林之宝笈也；然生于今时，谁其肯信？”（第97—98页）刘黄冈说：“读此篇，则作者以‘无何’名集，‘无何’二字即作‘无可如何’之意也，亦可。”（第81页）又说：“钟陵作《无何集》，千载而后，定当与仲任齐名。”（第98页）以上材料表明，先有《论衡精选》抄本，后改编为《无何集》抄本。曾为志同道合者称赏，但仍被视为“当今之世无有称之者”的禁书。该书直至乾隆甲寅（公元一七九四年）衡衡子才第一次刊印问世。后至乙丑（公元一九二五年）湖北沔阳卢弼借北京大学藏本影印第二次出版。以上两种版本全国各地图书馆已是屈指可数，知道的人很少。熊伯龙无神论思想长期被埋没，近几年来，才为较多的人重视和研究，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校点整理第三次出版，对研究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，提供了重要的文献。

熊伯龙自幼不信鬼怪奇传，力诋灾祥祸福迷信，著书立说，阐明无神论思想。至京师后（约公元一六四九年）数

年,读《论衡》,更加有意识地进行批判神学工作,《无何集》大抵于一六六〇年前后写成。所以,他的后半生,虽官居显位,从事政治生涯,而深入研究无神论的任务,却未中断。可见,他撰写《无何集》的宗旨是十分明确的。在自述中,他说:“欲以醒世之惑于神怪祸福者。且神怪祸福之说而外,亦间录他说,如天地、古今、儒术、杂家、人事宜忌、百物器用之说,有关名教风化,亦备录焉。然俗儒守文失真,时俗嫌疑莫定,凡史书、文集、百家、诸子所传记之文,其虚妄而不可信者,世已信之久矣,谁肯取斯编以正之哉!”(第6页)又说:“余以神怪祸福之说,时俗嫌疑,故抄数帙以明其妄。”(第7页)他深疾神学迷信,禁锢人心,由来已久,因此高举批判旗帜,这种反天命的无畏精神,表现了战斗无神论的本色。

这部书,熊伯龙对神学所有领域(除天主教外)都进行了批判和揭露,在我国无神论史上是罕见的。全书的着眼点放在对我国传统天命观和神学目的论的清算。从思想渊源看,他自觉地宗于汉代王充的无神论学说。他说:“钟陵自幼不信神仙鬼怪、祸福报应之说。……尝作《适逢说》……又尝作《鬼辨》,言人死之后如未生之前;作《神论》,言山神之形宜似山,水神之形宜似水。是时尚未读《论衡》也。后越数年,京师购得《论衡》读之,喜曰:‘予言有征矣。’读至《幸偶》篇,云‘有幸有不幸,有偶有不偶,’与《适逢说》同意;又读至《论死》篇,云人未生无所知,其死归无知之本,’与《鬼辨》同意;读至《纪妖》篇,云‘大山

有神宜像大山之形，’与《神论》同意。因欣然自喜，……古人先得我心，……因废《适逢》、《鬼辨》诸篇，取《论衡》之辟虚妄者选为一编，简当精要，且广集他说，以补其不足。”（第7—8页）但他又不完全拘泥王充全部论述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，在某些方面论述，有独到见解。比如：在揭穿神学虚假本质时，他风趣地机智地指出：“世谓山有山神，树有树神，山神形宜似山，树神形宜似树，胡为皆似人耶？或曰：人见之则似人耳。然则牛见之似牛，犬见之似犬，岂有此理也哉！”（第138页）破绽百出，令人发噱。他已意识到不是神创作人，而是人按自己的面貌创作神这个唯物主义原则问题。或者说，已经接触到这个无神论最高命题。不仅如此，而且对王充理论上的局限提出非难。他说：王充“言命近于星家，如言忠臣见杀，子胥、屈原、箕子、比干辈命当自讫。果如此，则昏主无过矣。又言韩信、张良辅助汉王，高祖命当自立，韩信、张良之辈适相遭遇，信斯言也，则忠臣无补天之功矣。且言命当自立，是又信禄命之说也。又言世之所以乱者，不以盗贼兵革，由谷食乏绝。此言是矣。然又曰：‘贤君偶在当治之时，无道之君偶生当乱之日，非恶所致也。’试问仲任：何为当治之时？何为当乱之日？是又信气运之说矣”（第11—12页）。深刻批判了王充的命运主宰一切的神秘主义说教。

熊伯龙是十七世纪我国杰出的无神论者，在《无何集》里，他主要遵循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、方法论，兼采范缜的关于形神关系的理论，运用这些战斗武器，去

揭示神学的虚妄性，抨击神学的要害处，在我国无神论史上作出重大的贡献。当时学者对熊伯龙无神论思想及《无何集》一书曾有过评论：阎百诗说：“予上下千古，自汉以前，得一大异人，曰王仲任；自汉以后，得一大异人，曰熊次侯。”高似孙说：“‘仲任叙天证，敷人事，核而精，肃而括，辨讹正谬，有裨后学，’余于次侯亦云。”吴云溪说：“《无何集》一书，非大有识见者不能作，非大有学问者亦不能作。”（以上均见 14 页）黄敬渝说：读《无何集》如“‘玩扬子云之篇，乐于居千石之官，挟桓君山之书，富于积倚顿之财，’非虚语也。仲任有知，必以先生为千载知音矣。”（第 7 页）这些评述，说明熊伯龙和王充在思想关系上为“千载知音”。在社会历史地位上同为“大异人”。论及《论衡》和《无何集》的社会意义，皆“有裨后学”。论及两者的内容皆“核而精、肃而括，辨讹正谬”，有关维系社会人心正义的大事。而且指出《无何集》是最好的精神食粮，以一读为快事，誉之为“乐于居千石之官”，“富于积倚顿之财”。其中虽然有些溢美之词，但大体说来，这些评价是精当的，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王充思想始终为统治阶级排斥，而《论衡》被列为杂书禁书。已佚的袁崧《后汉书》及葛洪的《抱朴子》都说《论衡》既作之后，中士未有传之者，直到一百年后，蔡邕入吴才发现它。博学如蔡邕，也只以它为助谈，而且心存戒惧，把它藏在密处，及至被王朗发现，还要再三叮嘱：“惟我与尔共之，勿广也。”及至宋代以后正统思想家们，对《论衡》都极尽

诋毁之能事。北宋吕南公惧怕王充批判和揭露儒家，故意贬低《论衡》的价值，连传播过《论衡》的著名学者蔡邕，也受到无理的诽谤。如说什么“夫饰小辨以惊俗，充之二十万言，既自不足多道，邕则欲以独传为过人之功，何谬如之！”（《题论衡后》）南宋时，黄震批评王充说：“欲以尽废天地百神之祀，虽人生之父母骨肉，亦以人死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，凡皆发于一念之怨愤，故不自知其轻重失乎如此。”（《读论衡》，《黄氏日钞》分类卷五十七）在《四库全书序》中，指责王充反对孔孟思想：“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？……诬及圣贤，为激语以自表，则有犯非圣无法之诛。”从这一侧面看，正好也说明《无何集》是一部有价值的著名专著，熊伯龙无神论思想闪耀着灿烂的光辉。

熊伯龙无神论思想的出现，决不是偶然现象，也不是凭空想象的结果，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。